

神学诗学
十四诗人谈

14 POETS TALK ABOUT
THEOLOGICAL POETICS

刘光耀|主编



S P I R I T U A L V I S I O N

【海内外知名诗人兼学者共同完成】

每位诗人文后均附有其代表性
诗作品,与其理论思考交相辉映

I207.32 53

2013.2

神学诗学

神学诗学 十四诗人谈

14 POETS TALK ABOUT
THEOLOGICAL POETICS

刘光耀|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刘光耀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108-1384-9

I. ①神…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 - 中国 - 现代 - 文集
②诗歌研究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9594 号

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

作 者 刘光耀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 行 电 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12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84-9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建设灵性文化，拓展灵性视野

神州大地改革开放三十年，春风吹拂、冰河解冻；在文化学术天地，禁区与敏感区都逐渐开放，学术界的破冰船呼呼向前，文化界的骏马骎骎日上。

以“灵性”一词涵盖具有基督教内涵的学术研究在学界已成共识，基督教神学在多所大学已被接纳，有人甚至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已成国内“显学”。各种与此相关的专业性研究机构如春笋破土而出，各种与此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为数相当的研究者也怀着极大兴趣投入此学术禾场，我们也惊喜万分地看到了他们劳动的成果。

灵性文化生机萌动，意味着中华民族胸襟日益开阔，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知性上和信心上加固加深，这个民族越发有自信来面对人类文明的多方冲击；她已经不是以简单的闭关锁国方式来维护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血脉。免疫的能力与我们的健壮相关。大唐时代西天取经的勇气，“五四”初期远洋留学的苦心，都值得效法和学习。今天，我们从学者们勇敢开放灵性文化门户也真切地感悟到这种勇气。当然，这都与改革开放衍生的学术文化宽容氛围不可分割。

诚然。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是为开场。

灵性文化的研究，对学术本身是有特殊意义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宗教与文化常处在血肉相连的“双胞胎”状态，我们实在难以

清晰区分何者走前、何者步后，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令我们发出无法控制的兴叹。我们在《诗经》的《颂》中，明显地看到宗庙祭祀的礼仪与歌咏；我们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也处处见到诸神登场；还有希伯来文化所带来的灵性祈祷；古埃及金字塔下亡灵书的叹息与企盼；古印度那些神秘的远古经书和史诗……

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企图把文化与宗教推上手术台挥刀切割，但毫无疑问，这起手术给共有的生命体造成大量出血，伤痛也重。把宗教完全从文化体中抽离而不闻不问，对于人类文明之一的宗教研究固然因缺席而荒芜，但对整个学术文化的探索也明显是缺其一角。更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当我们努力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对于“两希”（希伯来与希腊）文化更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因此，向灵性文化探足，既可以借着对基督教文化的探讨摸触到西方文化更深沉的积淀，反过来对自身学术的研究也会带来突破和开拓。

从文学角度说，如果灵性文化的研究最终给我们的文学家们引发新的创作思维进而取材与生活的切入点上有新的原创意涵，也必然有助于我们文学创作的多姿彩和多元化。创作的“受动”也必然反射到文学理论层面，令我们的文学理论也蒙“受动”之益。这样的辐射所产生的意义无远弗届。艾略特认为文学的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言外之意，他认为文学的宇宙应当比眼前的更宽广，即是说，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一些学者偶尔发出谋求“东方文艺复兴”的期盼，也许，对灵性文化大胆的思索，在一定层面也有助于这一文化愿景的实现。

是为说明。

在全球化动力下，我们不能不从更宏观角度看待中华文化的波及面，历来有一句老话：有海水处便有华人。完全可以进而延伸：有华人处便有华人文化。尽管这方面的“华人文化”具有不同深浅

高低度，有的地区因为种种社会因素只把这些边缘化的“华人文化”逼近绝处，但作为文化的多元存活形态是无法根绝的。今天，中华大地文化的生机，以及由之派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开拓）而出的灵性文化研究，我想对有海水处的华人及其华人文化都应有激励作用。这个作用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文化载体的推广，另一方面是所在地灵性文化的强化和生命化。

中国新社会的崛起，使全球范围内的华人都引颈期盼，希望居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化能产生一个更为绚丽璀璨的景观，这有助于海外各处华人扶助或复兴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各地多可见到的宗教活动，却都严重缺乏积极的思维配合。这当然是与各个特殊地区的文化深浅度相关。我们敢肯定，没有人文为帮助的宗教活动其影响必是微弱的。一切宗教实践若永远只停留在肤浅、简单、低级阶段，对于信仰者说只能是一种停滞状态。因此，此书的出版，除了在中华大地可以活跃学术界思维外，在境外的广大华人生活地区，不论是在文化推动上，或在灵性感悟上，当具不可忽视作用。

是为盼。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智慧令人折服，这一位不断探索的智人，寓意深长地说：“有两样事物是我越想越感到神奇和敬畏的，一是头顶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这说明上帝不但在我头顶，也在我心中存在。”他还有一句妙语便是：“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但是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

对于这样一个奥秘世界，我们理当心存敬畏。

是为序。

新加坡文学家原甸

圣经，诗，神学诗学

刘光耀

为什么要谈论神学诗学呢？

愚以为，神学诗学之首义当是神学。即要懂神学，知《圣经》：不知经，何以诗？这是不少朋友阅读时文时的常有之感。当然，话说回来，懂神学、知《圣经》者也未必就一定能写出好诗。留心其作者自称有基督信仰的诗作，这一点让人印象很深：不少诗作给人的感觉是有信仰，无诗歌；或有神学，无文学，即有了从《圣经》角度看无所不当的东西，但却没有了文学的美与魅力。这便引出了谈论神学诗学的另一层缘由：如何使基督信仰精神能文学地、富于诗之魅力地传达、表现出来呢？不消说，这是个诗艺问题，是关乎所谓诗学法则的问题。

那么，对这个问题，谁有发言权呢？

这让人首先想到的是诗人——当然，“诗人”在这儿是广义的，包括小说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等在内；这里说到的“诗”也当如是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通一艺莫谈艺”，这是这本集子里所约的各位作者都一定要是诗人的原因，且不少诗人如阿吾、李建春、周伟驰、施玮（美国）、宋晓贤和老诗人老作家原甸先生（新加坡）等，早已是诗名盛负了，施玮更是当今“灵性文学”的倡导人。“诗学”之为“学”，是从“诗”中“学”出来的；诗学法则离开了诗作自然无所从出。在一定意义上，不是诗学家而是诗人，才是诗学的给出者。诗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文学写作经验所做的反省，对于诗学无疑是重要的。在神学诗学构建初期，尤其在尝试以自己的创作来体现基督教精神的诗人、作家尚为

数不多时，这样的诗人之谈论显然便益显重要了。臧否真

当然，诗人未必是诗学家，好诗学家也未必是好诗人，而那些伟大的诗学法则、体系、范式等的给出者，如中国的老子、孔子，西洋的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更常常首先是哲学家。说到堪称神学诗学家的，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巴尔塔萨（Balthasar）等，则首先是神学家。尽管他们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也写诗，通艺术，如孔子、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他们都主要是以哲学、神学，而不是以诗、艺名世的。至于西方第一个写出《诗学》一书、为西方诗学奠基的亚里士多德，于文学写作上则似乎是隔得挺远呢。

这便意味着，对诗学最有发言权的，也许是哲学家、神学家，或是“诗人哲学家”、“诗人神学家”。本书所约的作者，大多数都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且有的更是哲学、宗教学界卓有实绩的知名学者，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伟驰博士。武汉大学荣光启博士的诗歌研究，则向为业界所称道。我在想，在中国，也许最优秀的神学诗学家会是在优秀的宗教哲学家或神学家之中，而不是在优秀的诗人当中产生，除非这个优秀诗人也同时是优秀的哲学家或神学家。因为恰如诗学的历史所表明的，诗学范式、诗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相应哲学、神学的形而上学为元叙事、元话语，而这一点显然是时下中国的诗人们所较欠缺的。臧否真

若大体可以这么说，有志于神学诗学的朋友首先要留意的，也许便是《圣经》、神学与哲学吧。我的打算是：今后好好跟着我的朋友、我心目中中国非常优秀的《圣经》和神学学者、合肥学院的章智源先生学习《圣经》，研究神学。章先生五十有余，却像大三、大四的学生那样年轻，也像大学生那样常背着背包，骑着摩托在合肥街巷穿行，为人“传道、授业、解惑”。有诗为证：

致智源

我多么愚蠢，亲爱的弟兄！
要过了十年才想起询问：
你怎么总青春赛少年？
中年人岁月的负累早让我两鬓霜雪，
时间是否已将你遗忘？
使徒一样激情，永远
俗尘不染你童子般微笑的面容！
驾摩托在都市的街区穿行，
你让人看见那位平息风和海的船长之身影！
双肩包鼓鼓囊囊，像施洗约翰
跨埃及海，经犹大的旷野，
在神州，像在加利利海边，呐喊：
“悔改吧，我的同胞，这里有可吃的书卷！”
亲爱的弟兄，
你知道我在瞎撞，像昏懵的老人。
快拉我加入你的行列吧——
大三大四的学生，
你真比天使还要年轻！

目 录

| | |
|-----------------------------|----------------------------|
| 序言 | 建设灵性文化,拓展灵性视野* 原甸(1) |
| 圣经,诗,神学诗学 刘光耀(4) | |
| 神学诗学发生背景 | |
| 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背景 周伟驰(3) | |
| 附周伟驰诗歌 5 首 (31) | |
|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代中国诗人的一种写作 | |
| 转型 荣光启(36) | |
| 附荣光启诗歌 3 首 (76) | |
| 神学诗学理论构想 | |
| 福音的诗学 李建春(81) | |
| 附李建春诗歌 4 首 (90) | |
| 神学诗学:神人诗学刍议 刘光耀(93) | |
| 附刘光耀诗歌 4 首 (130) | |
| 上帝:第一位诗人——从拙作《哀歌》设想“伊甸园 | |
| 诗学” 林季杉(136) | |
| 附林季杉诗歌 2 首 (154) | |

神学诗学探索

| | |
|--|----------|
| 灵魂被唤醒后..... | 原 甸(161) |
| 附原甸诗歌2首..... | (170) |
| “琴与炉”:灵性诗歌中的艺术特质 | 施 玮(180) |
| 附施玮诗歌3首..... | (188) |
| 社会批判与“隐性”写作——布莱克、艾略特、R. S. 托马斯对基督教诗歌艺术的启迪..... | 姜赞东(192) |
| 附姜赞东诗歌2首..... | (200) |

信仰与诗歌

| | |
|------------------|----------|
| 我的诗歌写作与基督信仰..... | 阿 吾(205) |
| 附阿吾诗歌2首..... | (210) |
| 信与诗..... | 齐宏伟(212) |
| 附齐宏伟诗歌3首..... | (217) |
| 汉语诗歌的美学缺憾..... | 宋晓贤(221) |
| 附宋晓贤诗歌2首..... | (231) |

诗学思考的多元进路

| | |
|---------------------------|----------|
| 诗歌:一种表现、丰富和塑造人的诗性的艺术..... | 张国壮(235) |
| 附张国壮诗歌2首..... | (243) |
| 从自我到自性..... | 马永波(248) |
| 附马永波诗歌2首..... | (255) |
| 写在意义出场之前——中国混沌神学..... | 赵 东(257) |
| 附赵东诗歌2首..... | (268) |
| 后 记..... | (270) |

神学诗学发生背景

神学诗学发生背景

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背景

周伟驰

当代基督徒诗人的涌现作为一个新现象

当代新诗界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一批“基督徒诗人”。^① 应当说，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往中国基督徒创作的诗更近于歌，是为了适用于教会内的咏唱，其作者主要不是以诗人名世（如金陵神学院的汪维藩教授），而且多为集体创作（如解放前的耶稣家庭的诗咏）。有鲜明个体特征的诗创作，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神学家赵紫宸先生算得上一个，但是他所写的是旧体诗词，与新诗没有关系。虽然现代文学家们与基督教有不少的瓜葛——这已成

^① 如由施玮主编的《琴与炉》（第一辑）（中国广播出版社，2008）收入26位诗人的诗，从作品品质来看，应该都是基督徒。这26位诗人是：施玮、北村、樊松坪、鲁西西、齐宏伟、空夏、易翔、杨俊宇、谭延桐、于贞志、新生命、姜庆乙、匙河、雁子、王怡、楚耳、海上花下、雪女、仲彦、东郑溪波、梦月、徐徐、陈巨飞、黄莹、殷龙龙、刘光耀。被遗漏在这本诗集之外的基督徒诗人还有很多，比如阿吾、李建春（天主教）、李浩、黎衡、沙光、黄礼孩。至于没有公开表明信仰身份、只在朋友圈的小范围里写作的基督徒诗人无法统计。对基督教持同情和欣赏态度，并写出有“基督性”作品的非基督徒诗人则更多。在网络上，会经常看见一些相关的诗作，但大部分有表达的热诚却缺少诗艺的成熟。较好的网站有“信仰之门”，会经常刊登一些原创诗歌。见：<http://www.godoor.com/xinyang/>（2009年6月7日搜索）。本文中“基督教”指广义的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及其宗派。

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①——但就新诗来说，除了冰心^②早期的一些小诗，陈梦家零星的诗作外，很难找得出烙有“基督教”字样的诗。一些新诗人会经由西方诗人的影响而用上“神”、“罪”的字样（如穆旦、^③海子^④），带上基督教色彩，但其跟基督教的精神联系到底有多深，则尚需要探讨。

而当代基督徒诗人与以往的不同在于，他们首先以诗人名世，许多人是在成为诗人之后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们的作品是在诗坛发表，面对大众，而不是教会，他们的诗歌的特质（区别于别的诗人的）主要跟基督教信仰有关。我国古代诗歌所着重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在被现代诗人们抛弃多年之后，现在在一个“外来”

^① 如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王本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宗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师大出版社，2003；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文化新批评》，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丛新强，《基督宗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这些研究涉及冰心、许地山、老舍、苏雪林、张秀亚、周信华、林语堂、曹禺、石评梅及当代的北村等基督徒作家，以及采用了基督教象征、形象、元素从而与基督宗教文化有关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巴金、庐隐、张资平、郭沫若、沈从文、萧乾及当代的史铁生、余华、刘震云、老鬼等人，论者的立场、治学态度与水平各异，立论有严谨的，也有不乏牵强的。据笔者所知，目前在大陆及港台都有一批博士生在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如林语堂）。当代作家和诗人与基督宗教的关系虽有零星涉及，但似尚无专门研究。

^② 冰心是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最为推崇的中国作家，因为她代表了基督的爱与救赎的精神，正好与鲁迅之“虚无主义”相反。当然，对于鲁迅是否虚无主义是值得讨论的。

^③ (韩)吴允淑，“穆旦诗歌中的基督话语”，《道风基督教学评论》，总12期，2000。

^④ 海子在山海关自杀时随身带着的四本书里就有《圣经》。随着“海子热”的出现，海子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也成了一个讨论的热点，不少传记里都会提到。但关于海子的诗里有多少基督宗教影响，海子对基督宗教的体认有多深，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参：王本朝：“海子与基督宗教文化”，《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宗教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何桂平，“一种世界，两种美丽：论基督宗教影响下的闻一多和海子”，《东京文学》2008年第9期。

宗教的诗人们身上得到了体现。历史确实具有反讽性。

一般宗教上的原因

当代诗人归入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可能有宗教上的一般原因和基督教的特别原因。

宗教上的一般原因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总会有多元的宗教上的、灵性上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社会渐趋于正常，无神论教育虽在继续，但各种宗教的信徒都在增多，诗人们自不例外，因此出现有佛教的、道教的、基督教倾向的诗人，只不过是在恢复正常状态而已（与此前三十年以无神论的信仰压制和消灭其他的信仰的不正常状态恰相对照。我们可以看看闻捷、郭小川的诗）。宗教信仰作为一种信仰，是为了克服怀疑和虚无，为人生作一个定准，使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有一个指针，而不至完全被偶然性和荒谬所主宰。诗人们因其敏感，对虚无再行“拨乱反正”，恐怕也是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入释，有人入道，有人入耶，有人入新兴宗教，也就可以理解了。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传统障碍不复存在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各大宗教都在利用交通和资讯的空前便利加速传播。基督教本来就是世界最大宗教，目前其在第三世界的信徒人数业已超过欧美，已成为一个南方宗教。^① 其在中国的发

^① 可参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2002. 中译本为：《下一个基督王国：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来临》，梁永安译，台湾立绪，2003。另可参：Peter Berger,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Grand Rapids, Mich., 1999。李骏康译《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展符合传播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跟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

我们知道明清时天主教丧失在华发展黄金期是由于“礼仪之争”（涉及皇权与教权之争），解放前新教在华发展不快是由于“洋教”色彩太浓，总令人想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知识阶层来说，则是由于启蒙主义之无神论由欧洲传来，知识分子视有神教为迷信，这在“非基”运动和“科玄论战”中表现明显。在普通民众阶层，中国本土的宗教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尚维护着一个宗教生态的平衡。

改革开放后的特殊国情是，三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和反传统教育，使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真实的了解。对外开放骤然间使人们看到西方整体上的先进性，因此社会心态不是反“洋”，而是“崇洋”。政党意识形态经过“文革”已难具威信，整个社会进入“信仰真空”。

这时，基督教传播的几个传统障碍都被清除了：儒教作为制度早已彻底消失了；释道和民间宗教被当做封建迷信扫除了，引起“礼仪之争”中的传统礼仪普遍不被遵守了（而且基督教对此已作了调整），因此本土宗教的制衡淡化或消失了；源于启蒙主义的无神论反造就了对人民大救星的狂热信仰，政党信仰幻灭了；“洋教”色彩越来越淡，都是中国人自己在传播，同时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也正成为南方宗教，而越来越跟西方没关系（吊诡的是，一些人信教反而是被“洋”味吸引去的）；共和国早已独立，谈不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威胁，现在至多只讲和平演变，反而是西方在谈中国威胁论，视孔子学院为和平演变。在传统的教会等级组织之外，基督教以小群、熟人间方式传播，使人数快速增多。

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八十年代的“韦伯热”反映了在他们心目中，基督教（新教）是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也可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因素。一九八八年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批判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西方虚无主义，而力倡基督教的“拯救”